

# 《张学良口述史》读书报告

## ——九一八事变

李 翰 韬

摘 要：《张学良口述史》是唐德刚先生以张学良对其自述为主体，而创作出的优秀作品。是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在 2007 年 7 月 1 日出版的。本书很好地更正并弥补了往前评价张学良图书中的各种不足。张学良的一生跌宕起伏，而他在九一八事变做出的“不抵抗”政策广为世人所诟病。本文从就九一八事变一事，从九一八前后的形式分析入手，分析了张学良下达“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并对之加以评价。

关键词：张学良 唐德刚 九一八事变

李翰韬：工科试验班类（启明书院），周四 7/8 节，学号 16711094，手机 18201625694

《张学良口述史》一书是由张学良的自述为主体，以唐德刚先生对于张学良自述的评论为辅体的一本优秀书籍。相较于以往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有关张学良的书籍，唐德刚先生的《张学良口述史》立足于两个角度。一是张学良的自我叙述，二是唐德刚先生立足于更高角度的评价，使得读者可以从两种方面更好地审视这一段历史，也让此书叙述的这一段争议颇多的历史更加真实透彻。从这个方面来说，《张学良口述史》一书是我们研究张学良波荡起伏一生最好的途径。

张学良的一生可以说是饱受争议：有人说他的不抵抗政策全是因为蒋介石的命令，有人说他是丢掉东三省的罪魁祸首，是他为中国带来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有人说他是推动国共合作的英雄，也有人说他发动双十二事变纯粹是立场不

坚定地为一己私利，还打乱了蒋介石的抗日部署。

经过通读《张学良口述史》，我认为对张学良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事件应当是“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而在此读书报告中，我想站在张学良的角度来分析他在这九一八事变中的功过是非。

## 一、“不抵抗政策”

想要分析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的功过是非，就要先从三年前的皇姑屯事件说起。

1928年6月4日，张学良父亲，东北王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在凌晨五点三十分于皇姑屯被日军事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身负重伤，回到宅邸后身亡。6月23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其取得东三省的领导权。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此时，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全中国。

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蒋介石此时虽然名义上为中国最高统帅，但在全国各地仍为军阀割据。这一点从之后的中原大战和中东路事件上可以明显看出。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蒋介石并没有给予张学良的东北军应有的军事援助，只是单单地拍出张学良与苏军交战。众所周知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这一场战争中惨败，张学良是这么自我叙述的：“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sup>①</sup>张学良向唐德刚作口述时，是这么给自己下的定论。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当时“很想施展一下子”。但当时的东北军装备远远落后于前苏联，很快，苏联靠着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得到了压倒性的胜利。“打得那个惨呐，有一个旅整个全灭了，是一个姓韩的当旅长，整个全灭了呀，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

---

① 摘自《张学良口述史》，唐德刚

有了。”<sup>②</sup>

客观的说，就算当时忙于内陆军阀混战的蒋介石政府拿出一部分兵力支援东北军，东北军也很难战胜苏联军队。但是蒋介石对张学良毫无助力的行为，想必已经在张学良的心中埋下了芥蒂。而在张学良的口述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么一句话：“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的东北军自中东路事件以后，已经从上至下失去了与苏联军队作战的信心。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第一次大的对外军事行动。战争的惨败无异于给意气风发的张学良当头一棒。而可以想到的是，张学良那时对于在几十年前战胜过俄国人的日本军队，肯定是感到惧怕的。这也必然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件中采取不抵抗政策的一大原因。

首先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九一八”发生之时，蒋介石和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都没有向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军下达“不抵抗”的命令。事实并不如一些人所说的：张学良在东北一枪不发是因为蒋介石提前下达的不抵抗政策。可以说，东北军所施行的不抵抗政策是由张学良亲自下达的。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九一八事件的始末：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北大营；19日，日军攻占沈阳，随后一周内攻陷城池三十座，占领辽宁、吉林。11月19日，日军攻占齐齐哈尔；次年2月5日，日军攻占哈尔滨。九一八事变仅仅四个半月后，东三省一百三十万国土全部沦陷。而日军在东三省飞扬跋扈的原因，就是东北军所奉行的不抵抗政策。

首先阐述判断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达的依据：

---

② 摘自《张学良口述史》，唐德刚

九月十八日当晚，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的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日军的枪声一响起，东北军驻沈阳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便通过电话请示上级。他打给的是当时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荣臻命令赵镇藩不要抵抗日军，将武器放回库房里，“大家成仁，为国牺牲”。<sup>③</sup>显然，赵镇藩也遵守了上级下达的不抵抗命令，由此，日军长驱直入，并在四个半月后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让后人疑惑的是，荣臻仅仅作为一位长官公署的参谋长，为什么敢于下达如此“大逆不道”的指令呢？经过查阅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在9月6日，也就是九一八事件发生的十二天前，荣臻收到了一封来自张学良的电报，电报中张学良命令荣臻，对于日本军方的挑衅行为“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sup>④</sup>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张学良接受《大公报》记者时的言论也能作证这一点。张学良坦言“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不仅如此，在本书中，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先生的采访时说道“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不是的！这个绝对不是的，不是事实”。<sup>⑤</sup>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实行的“不抵抗”政策，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亲自下达的命令。这也让许多人认为张学良是擅自避战，一枪未发，放弃了东北战线，是个不折不扣的软弱的纨绔子弟。但我们回看荣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的言论，若只是丧权辱国地逃跑，怎能有如此底气

---

③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2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④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张学良文集》第488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

⑤ 摘自《张学良口述史》，唐德刚

呢？

张学良所下达的“不抵抗”政策，真的与蒋介石总司令和国民政府没有关系吗？下面我们来分析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态度。

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后，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政府从未向东北军下达明确的抵抗日军的命令。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张学良以及东北军早已发现日本人的蠢蠢欲动，东北军的态度在一开始很强硬，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sup>⑥</sup>但蒋介石却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直接否定了张学良提出的“抵抗”政策，这也说明了张学良“不抵抗”政策出现的根源还是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传》中曾经提到，国民党的资料否认蒋介石使用过“不抵抗政策”一词，但是不否认蒋曾经命令少帅避免与日军冲突。<sup>⑦</sup>

在 9 月 15 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前三天，东北军就已经发现日关东军有明显异动，东北军边防长官当面请示张学良。张学良的答复是“蒋委员长告诉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sup>⑧</sup>可以说，此时张学良已经认定蒋介石在东北的军事方针就是避免与日军的军事活动。而这种理解也显然是

---

⑥ “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我猜想那就是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缘故，要我首当其冲。”（《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 425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⑦ 摘自《蒋介石传》，布赖恩·克罗泽

⑧ “蒋委员长告诉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你迅速回去，请辅帅相机处理。”（《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 15-16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

正确的。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早在九一八事件之前，张学良就从蒋介石处得知了国民政府对于东北地区日军的态度。蒋介石虽然没有明令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但其前前后后多次表示了对日本明确的态度，也曾明确告诉张学良“不能酿成军事行动”，这极大影响了张学良，使得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而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蒋介石政府依然没有命令张学良抵抗日军。在9月19日对张学良发出的紧急电报中<sup>⑨</sup>，蒋介石并没有提及抵抗一事。在同日晚召开的会议中，蒋介石政府得出的决议仅仅是“继续对日方提出抗议”<sup>⑩</sup>，依旧没有提出抵抗日军。而在22日发出的《告全国国民书》<sup>⑪</sup>中，蒋介石更是做出了如下的言论：“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从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件后仍然实行“不抵抗”政策，与蒋介石做出的“对日军避免冲突”的态度有很大联系。所以唐德刚先生在书中说，“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sup>⑫</sup>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在不违背蒋介石命令的前提下，是没有选择余地的。

可以说，虽然蒋介石从未明确对张学良提出“不抵抗”政策，但在张学良违背国民政府的命令，放弃锦州之前，蒋介石对日本军队保守且懦弱的态度极大地影

---

⑨ “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279页）

⑩ “决议：一、由常务委员电请蒋主席同京。二、根据正式报告，继续对日方提出抗议，并电命驻外代表向国际间宣布。三、即日发对各级党部训令《令文附后》。四、从明日起每日开中央委员谈话会一次。”（录自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九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录原稿）（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278页）

⑪ “政府此时既以此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摘自《告全国国民书》

⑫ 摘自《张学良口述史》，唐德刚

响了东北军的行。“不抵抗”政策的出现，是无法单独地归咎于某一方的，一定是张学良的思考与蒋介石的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张学良作为一个军阀出身的人。他做的每一步决定都是出于一个军阀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的，都是基于自己的地盘、军队、权力考虑的。这一点从后来的一件事中就可以看出：当国民政府要求张学良“死守锦州”之际，张学良出于自保，并未执行该命令。<sup>⑬</sup>说明张学良的行事准则中，还是会极大限度地考虑自己和东北军的利益。

而正是这么一个重视自己利益的张学良，却一枪未发，将其父张作霖辛苦在东北打下的家业拱手让给日本人。这显然不仅仅是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态度能左右的，那么除去蒋介石的影响之外，张学良下达“不抵抗”政策的原因还有什么呢？

## 二、张学良“不抵抗”的其他原因

第一个原因已在先前提及。东北军于先前的中东路事件中惨败于苏联，张学良也自此锐气顿失，做事畏首畏尾。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东北军在关外可以作战的军力甚至不如之前。

在九一八事变一年前爆发的中原大战中，张学良向华北派出了东北军精锐嫡系部队。而作为中原大战的获胜方，张学良自然不会白白放弃自己的战利品，他也时刻做着逐鹿中原的打算，所以这只部队直到此刻还在关内驻扎。九一八事变时，整个东北三省只剩下 14.2 万正规军和 1.3 万非正规军，而张学良的嫡系部队只有 3.3 万正规军和 6000 非正规军。

---

<sup>⑬</sup> “如果蒋先生，军事委员会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我就打，我非服从不可。但要我自己动，我不干。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你真要打？那我打，否则我不干。”（2001 年 10 月 28 日台湾《联合报》）

以这样的军队实力，张学良当然不会有信心独自战胜曾经赢得过日俄战争的日军。他当然不想去打一场“日本人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要占你什么地方，就可以占什么地方”<sup>⑭</sup>的战斗，又何况是在国民政府“避免抵抗”的论调下呢？

第二个原因在于张学良对形势判断的失误，以及寄希望于国联干涉。1936年6月，张学良说过一段话：“‘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没有把事变的起因和演变，认识得清楚，把握得住。”<sup>⑮</sup>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开始时做的就是“委曲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而为什么张学良会对日本侵略者采取这种态度呢？这是因为在张学良正强烈的惧怕日本的心理作用下，在国民政府不提供兵力支持的情况下，寻找不到独自战胜日军的方法。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其他列强能够提供调解的侥幸心理上了。

皇姑屯事件时，关东军就打算借机侵占东北，给应付过去了；易帜之前，日本又以武力相威胁，也应付过去了；铁路问题交涉，一直拖延搪塞，“中村事件”也还在继续拖延。“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了，这次也能敷衍过去”<sup>⑯</sup>

在同唐德刚教授的交谈中，张学良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捣了许多年，捣了许多次了”“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

---

⑭ “现在我们中国的军队，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无不是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日本人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要占你什么地方，就可以占什么地方。”（《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一册431-433页）。

⑮ 摘自《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张学良

⑯ 摘自《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沈云龙



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历史上都是采用这个办法呀，假如我知道这事情化不了，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方法就不同了”。<sup>①</sup>

但显然张学良的如意算盘打空了，站在我们后人的角度来看，“不抵抗”政策实为丧权辱国的失败之策。因为由被公布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国内也并不是团结一致的。九一八事变实则由关东军中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一群少壮派军官擅自决定的，本身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军事冒险行为，连关东军司令庄本繁事前都不清楚此事，更不要提日本国内主和的政府和文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旦初步战略受挫，必然引发内部各派势力矛盾激化，而激化的结果很可能导致这批发动事变的军官成为替罪羊。因为这一次，日本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东北的，真正面对东北军的只有这群冒险家，一旦一击失败，很可能再没有继续的能力，而是作为国内各派斗争的牺牲品。

从这一点看，张学良错误的形势判断直接导致了“不抵抗”政策的下达，也错过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最有利的时期。

最后，我认为从根本上导致这种局面的，还是张学良极端且武断的做事风格。我们可以从很多事情中看出他这种极端的做事风格：从一开始的东北易帜到中原大战，张学良都坚定不移地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其实这两个决定都极其冒险，但最后都获得了成功，这也让张学良对自己的决策方式信心大增，从而有了后续中东路事件中的惨败。

在中东路事件中，张学良并没有对苏军实力做出明确合理的分析，就武断地

---

<sup>①</sup> 摘自《张学良口述史》，唐德刚

下定决心进攻苏联，落得个惨败的下场，让张学良信心大失。但滑稽的是，张学良仅仅是对东北军实力失去信心，却没有对自己武断的做事行为失去信心。

在接下来发生的九一八事件中，张学良果断地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一群日本中等军官擅自挑起的事端，不敢处理，使得事情闹大，最终成了全国罪人。这件事情看似因中东路事件导致的畏战，但实际上，还是张学良本人做事极端化、不周详的特点导致的结果。

甚至从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这种性格也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这也说明了张学良武断极端的处世态度也确实影响力其一生。

### 三、余论

如今我们后人对张学良议论纷纷，我们都基于自己的判断对其的功过是非做出自己的评价。

我们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北白白丢掉东三省，不发一枪将日寇放进华夏大地。但回到当时的时局，张学良又怎么知道日本高层内部的分裂？他又怎么能想到日本人竟然敢全面吞并中国？而正因为谁都没想到这一点，当时全国奉行的“对日军避免冲突”也正是基于此而考虑。

再回看当时的张学良，在他当时的视野里，东北军确实没有与日关东军一战的实力。何况在一旁还有虎视眈眈的俄国势力、表里不一的中央政府、各怀鬼胎的皖系、桂系、直系、晋绥系军阀……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妄言张学良是叛国贼很容易，但如果是我们处在当时的位置，易地而处，我们又会不会将日寇放进东三省呢？我们在这里的所有言论，也都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少帅的功过是非，我们也只能说罢了。